

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历史剧

——读《郑和下西洋》

晴 帆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希望：“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①。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希望在史学上虽未得到充分的实现，然而在文学上却绽开了一朵妍艳的鲜花，这就是发表于去年第五期《收获》上田遨和冰夫同志的电影剧本《郑和下西洋》。我想，如果向达九泉有知，他将不但会以史学家的严格态度鉴别该剧在史料选择上的优劣，更会以文学家的眼光鉴赏该剧在艺术创作上的得失，从而露出会心的笑容的。

在十五世纪初期的二十八年(1405—1433)，郑和奉明代永乐和宣德皇帝之命，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游历了南洋、南亚次大陆、西亚、阿剌伯和东非的近四十个国家，沟通了中外交通，建立并加强了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了贸易关系。他在航海史上所建立的业绩早已誉满全球，永载史册。英人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曾对郑和作了高度的评价，说是“在十五世纪前半期，由一宦官所率领的船队，在南洋和印度洋上展开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航海活动，从而大大地增进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并带回了各种奇珍异品献给朝廷”。我国清末改良派的梁启超也说：“刑余之人，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吾史之光也。”

因此，如果说汉代的张骞从陆上构筑了我国人民同西域人民的友好之路的话，那末，时间推移了一千五百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郑和则又从海上架设了中外人民交往的金桥。他对南亚、阿剌伯、东非的发现，较之西班牙人哥伦布之发现美洲新大陆尚早数十年。应该说，郑和的业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郑和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怀念他、效法他是我们民族中先进分子的良好心愿。从这个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可以说群众早已渴望中的创作。

自然，郑和的形象并不是第一次在文学上出现，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出现的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就是据郑和航海事迹创作的。鲁迅先生一方面说它“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黄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对其创作有所肯定。另一方面又说它“侈谈怪异，专尚荒唐”，并且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划入“明之神魔小说”一章，可见又不把它当作现实主义创作看待。实际上，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更应该强调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的，应该“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是像对曾经建立过光辉事迹的郑和，无中生有的随意生发自然不足取，但作家是把他写成超群众的天

生伟人，超越了阶级和时代局限的高大完美的“英雄”，还是奴颜媚骨的阉宦，抑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这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创作原则的分水岭。令人高兴的是：田遨和冰夫既避开了《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冥冥之想，又摒弃了那种违反历史真实的唯心臆造，而是严格按照历史所提供的资料，发掘历史的史实和意义的真实，经过合理的构思，使其创作达到了艺术真实的完美程度。这正是现实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比起那些无视历史事实的任意编造情节、虚拟事物的“创作”来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是被广泛称赞并为不少作家所辛勤追求的，但是，真的达到这个要求又谈何容易。即以郑和这个历史人物和他的航海事业来讲，究竟写什么、怎样写才算臻于历史真实的境界呢？这往往又见仁见智，因为历史现象本来就是复杂的，更何况像郑和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比如，他本人是个高级太监，要不是得到永乐皇帝的重用和支持，他将是一事无成的；永乐皇帝派遣郑和耗费巨资，七下西洋，虽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却是同封建帝王消除异己、建立勋业的意图紧相联系的。而这，同航海家郑和的心思又显然不同；郑和之所以会得到永乐皇帝的青睐，自然又有其被利用的方面。这种种复杂的因素，就构成了需要作家精心解决的重重矛盾。一个作家的识见和修养，往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郑和下西洋》的作者并没有抛开这些矛盾去一味涂抹他们理想中的人物，相反正是透过这纷纭的矛盾，抓住了历史真实这一原则去编织故事、塑造形象的。作品使我们看到，郑和的出洋固然由于永乐的钦点，因为失去了这一点便丧失了历史的依据。但是却又同郑和自幼怀有的志趣相关，因而才能使他百折不挠。原籍云南的郑和，早年受其父辈的影响（据史载：郑父哈只，马姓，为伊

斯兰教徒，营商），曾同其女友白珍珠向往着航行到天方。所以，他的下西洋，虽是奉命而行，又是宿愿的实践。由于有了这层关系，便给了郑和无限力量；也使得他的性格发展得到了一个坚实的根基，合理而又可信。这自然也符合历史的真实。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核心在于塑造历史的真人，这就既反对对历史人物作超越阶级和时代的苛求，也无须对历史人物作无谓的拔高，而应当把他们塑造成为一定阶级、时代所可能出现的、血肉具备的人物。恰恰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某些名家之作，处理也并非善尽美。而在《郑和下西洋》中所塑造的郑和，无疑却取得了足资借鉴的经验。一方面，他的航海事业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得力于永乐的支持，依靠他长辔的志愿，同时也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执行了一条比较合理的路线，以及一定的物资技术力量作后盾。另一方面，在他面前还有一系列困难有待克服，他要战胜相对强大的政治对手，使得他们屡战屡北；他要克服恶劣的气候所带来的厄运，使得航海大军从悲观迷信的精神境地解脱出来，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他要排除心怀叵测的副使王景弘所制造的种种干扰，尤其是他那蓄意宣扬的所谓天朝武功，实际是穷兵黩武的破坏；他还要消除由于海盗的破坏挑拨所造成的海外诸邦对庞大船队的疑惧。如此等等，真可以这样说，郑和的航海事业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艰苦历程，郑和的栩栩形象就在重重矛盾中得到塑造，郑和这个历史人物及其生活的历史环境也在错综关系中充分展现。

《郑和下西洋》中的郑和在重重矛盾的发展中，不但成就了一个历史的伟人，而且显示了他还是一个以骨骼为躯壳、以血肉为形体、以七魄六欲为灵魂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常人，只不过由于生活逻辑的一种特殊发展，才造就了他的特定业绩。可以试想，即以郑和生活的时代来讲，怀有远大的航海

志愿和美好憧憬的少年又何止郑和一人，但是能够实现这种愿望的却又毕竟只有郑和一人。如果追寻一下原因的话，那当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求，但对郑和来说，却决不能忽视明王室燕王同建文帝的一次内哄战争。这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是福是祸，我们这里姑且不论，单就对郑和的命运来讲，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是这场战争，使郑和被燕王所赏识，取得了燕王的宠幸，但也拆散了他同珍姑父女相依为命的小家庭，摧残了他同珍姑青梅竹马的纯真爱情；而郑和入燕王府时被选为皇室阉宦，又给他终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遗憾。正是从这里开始，才一层深入一层的展示了郑和航海事业的辉煌成就和个人生活的极端不幸。这幸与不幸的交织，不也正刻画了郑和这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吗？

的确，在战胜强手、克服矛盾中，郑和所具有的凛然正气和坚毅精神、远大谋略和冷静态度，在在都显示了他不愧是一个历史上的伟人。但是，生活的磨难和情爱所加于他的波折，又使他具有深沉的悲痛和火热的情怀、美好的缅怀和凄楚的遗恨，处处都证明他确是一个未脱尘世的常人。关于这，我感到特别需要提及的还是作者关于郑和与珍姑感情的描绘。不管是他们两人“要一起在海面上航行，一起去找那个仙境去”的誓言，还是郑和船舱中那轴长期悬挂的天妃画像，也不管是郑和对珍姑的一往情深，还是他们在天方的邂逅相逢，这种人生旅程上的悲欢离合，往往能够摧人泪下，不可忘怀。尤其是那幅贯穿全剧而又同郑和形影不离的天妃画像，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幅溶合了珍姑形象的天妃像，竟会使得郑和那样深情脉脉，缱绻遐想，给了他那么大的激情和力量，以致使他有时作虔诚的表白，有时烦躁难安，有时悲愤不已，有时甚至咬得手指流血。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精心构思。按诸史

实，一九三七年在福建长乐发现了一方石碑，碑文是郑和船队于一四三二年所写的一篇铭谢文，文名：《天妃之神灵应记》。其中就讲到“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祐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这是船队对天妃的诚敬心情，大概作者正是以此为依据，而作了大胆的艺术驰骋，才创造了珍姑的形象，并结构了他们的爱情故事，而表现了郑和的儿女之情的。恰恰是这种儿女之情，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人情味，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的。

现实主义原则自然并不仅仅意味着照搬生活，而且还必须表达作者一定的思想倾向。在《郑和下西洋》中，作者那饱含深情的笔触，始终是渲染在郑和的事业和生活上的。对他事业的歌颂和他生活的同情，鲜明地向读者揭示出：“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成就在某种条件下可能相当辉煌，但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是逃不掉悲惨命运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但是，也许正是这倾向在作怪吧，《郑和下西洋》中的人物，又壁垒森严地形成了两个阵营，而反对派一方的人物又未免脸谱化、概念化的窠臼。这固然易于表达作者的是非观和爱憎感情，但却也难免将生活和人物作简单化处理，从而又背离了现实主义原则。不过，任何作品都难免瑕瑜互见，只要它基本上忠实于历史真实，那就是瑕不掩瑜，因而也就值得我们欢迎了。

注：

① 见《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48页，向觉明《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